

ZHONGXUE YUWEN
JIAOXUE FA SHI JIANG

中学语文教学法

十讲

张占杰◎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ZHONGXUE YUWEN
JIAOXUE FA SHI JIANG

中学语文教学法

十讲

张占杰◎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芜湖 ·

责任编辑:潘 安
装帧设计:丁奕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学语文教学法十讲 / 张占杰著. —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676-2821-2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中学语文课—教学研究 IV. ①G633.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86122号

中学语文教学法十讲

张占杰 著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 <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 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700 mm×1 000 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240千

书 号: ISBN 978-7-5676-2821-2

定 价: 38.0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讲 中国语文教育的发展	7
一、古代语文教育	7
二、现代语文教育	17
第二讲 语文与语文课程	28
一、“语文”的概念	28
二、语文课程	29
第三讲 语文教材	40
一、中学语文教材的内部结构	40
二、中学语文教材的结构类型	51
第四讲 语文教师	55
一、新课标下语文教师角色的转换	55
二、语文教师的人格境界	57
三、语文教师的素养	59
四、语文教师的教学能力	67
第五讲 语文综合性学习	71
一、产生背景	71
二、概念及其内涵	72
三、基本特征	72

四、语文综合性学习中的师生关系	73
五、教材设计	74
六、实施方式	76
七、实践误区	77
第六讲 阅读教学	81
一、阅读教学的目标	81
二、现代文阅读教学	82
三、文言文阅读教学	97
四、课外阅读指导	99
第七讲 写作教学	103
一、写作教学目标	103
二、写作教学策略	105
第八讲 口语交际教学	111
一、口语交际教学目标	111
二、听话训练	112
三、说话训练	113
第九讲 语文课程评价	115
一、基本概念	115
二、日常教学中的语文课程评价	116
第十讲 语文教学基本技能	119
一、教学设计	119
二、说课	127
三、教案写作	128
四、课堂教学导入	130
五、教学中的过渡语	132
六、课堂上的讲解	134
七、课堂提问的艺术	138

八、事实情境的描述	141
九、虚拟情境的设置	143
十、课堂收束的艺术	146
十一、教学能力提高的方式	148
主要参考文献	154
附 录	157
新课标下文本分析在高师语文教学法中的教学建构	159
创作与解读的冲突——重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163
两位父亲的对话——重读《背影》	171
《藤野先生》的解读问题	176
有意误读的缺憾——谈中学语文教材《我的叔叔于勒》的删节问题 ..	181
“立人”的散文教材文本——推荐孙犁的《记邹明》	188
后 记	194

前 言

随着新课标的颁布，中学语文教学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中学语文教学新时代的主要标志有三个：语文课程性质的重新界定，教材内容和形式的改变，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对语文教师而言，专业成长方向需要有一个较大调整才能适应这场语文教学的变革。

第一，语文课程性质的重新界定促使教师加强人文修养。

1902年《钦定中学堂章程》颁布以来，初中（义务教育）阶段教学大纲达22种，新中国成立后自1956年起颁布的教学大纲有12种，对语文性质的界定大多从工具性和人文性两个维度进行，时代不同，两者内涵不尽相同。

对语文的工具性质，大纲时代大多界定为：语文是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语文学科是学习其他各门学科的基础。因此，将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作为语文教学的两翼，采取强化训练的方式就顺理成章了。新课程标准对语文的工具地位并没有否认，但采取了另一种解释：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基础上，语文教学使用“语文素养”的提法代替原来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提法，从“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诠释这一概念，既包括原来的“双基”内容，又增加新的内涵，“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提法考虑了学习过程和范围，强调了语文学习对学生的尊重，在塑造学生健康而丰富的精神世界方面起决定性作用，这充分体现了语文课程“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特点。新课标之前的教学大纲，人文性的内容也有规定，只是界定的范围较窄，较多地体现当时的意识形态要求，如：语文学科对于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开拓学生的视野，发展学生的智力，激发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感情，培养学生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培养社会主义的思想品质和爱国主义精神。在新课标中，人文性的内容界定更为详细，值得我们关注的内容在于，它将学生逐渐养成良好的个性和

健全的人格，促进德、智、体、美的和谐发展，作为语文教学的目标之一，突破了大纲时代对语文人文性的界定，从人文主义精神的高度看待语文教学。

对比大纲和新的课程标准对语文课程性质的界定，可以看到，课程标准将原来割裂的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统一起来，从现阶段学生精神成长的高度认识语文课程，定位明确，有利于确立语文课程的独立地位。正如许多专家所言，语文教学中人文精神，是以人文主义为精神内涵，以尊重学生为逻辑起点，从教师角度考虑，教师是这种人文精神实现的直接执行者，换句话说，教师身上人文精神的多寡直接影响到课标的实现程度。人文精神所特有的关怀、理解、尊重人的生命需求，生命状况和心理诉求、情感、追求等，教学过程中应有所体现。教师还要站在较广泛的人文视野上看待语文，通过各种方式建构学生的知识，在义务教育阶段建构学生健康而独特的价值观，对独立思考自觉追求。总之，要在这一阶段打下学生“精神的底子”。这是新课标对教师人文素养的基本要求。

就精神成长的历史环境而言，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语文教师与鲁迅、叶圣陶、夏丏尊等大师有很大的差别。叶圣陶、夏丏尊等是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精神世界中人文主义影响根深蒂固，自由思想、人格独立的追求浸透在血液当中，这构成了他们教学的主要内容。看一看这一代教师的学生的课堂回忆，我们会清晰地感到与当代语文课堂不同，知识技能的传承中上述精神追求贯穿始终，这些学生回顾时感受最多的是老师对他们精神信仰的培育。相对而言，新中国成立后，语文课堂科学主义占主导地位，从根本上说不是一个课程理念问题。新课标以人文主义精神作为语文人文性的自觉追求，是多年来知识界努力的结果，是社会进步，倡导以人为本理念的结果。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学教师多年来在科学主义教学观引导下逐渐形成的一套教学模式与近几十年来升学制度的挤压，使他们由被封闭到自我封闭，与学校外的世界隔离，对新的教学理念理解有许多偏差，心理上矛盾，希望改革但害怕改革，对新课程充满期待但觉得它离自己太远。如果教师对自己应有的人文品格没有足够的认识，新课程就失去了应有方向。可以说，新课标实施能否达到预期目的，最关键的因素在于教师的适应程度和自觉程度。教师与时俱进是新课程实施最可靠的保障，适应新课程需要，与学生一起成长，是教师自我超越、走向自觉的最佳途径。在这种情况下，培育、充实语文教师的现代人文精神就显得相当迫切了，它成为新课标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

第二，教材内容和形式的调整促使教师加强教学文本的独立解读能力。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学语文教科书开始引入“教学目标”。1982年的

教科书虽没有明确这一概念，但在教学参考书中以“教学要点”的形式出现了。1993年人教版教科书的编写者按照能力要求的高低程度与学生的认知特点将教学大纲中的各种教学目标细化，编入每一个单元和每一篇课文。与此同时，许多省份还发行了与教科书配套的《目标教学手册》《语文教学目标实施方略》等材料。在教学目标的描述上，编写者尽可能多地使用行为动词，将教学目标转化为可观察、可量化的学习行为，便于教师据此把握教学重点、难点，教学内容的深度、广度，更为准确、科学地组织教学。教材的选择首先是要符合国家意识形态标准。对有些不那么符合标准却因为作者的地位和定评等因素而难以割舍的文本，则采取两种方式处理：一是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进行删改，削足适履；二是在教学参考书上以权威的姿态对文本作出符合要求的解读。这两种方式的文本解读，都是对文本的有意误读，取消了教师文本解读的独立性，教师由此变成了传声筒。无怪乎有的教师说，中学语文的文本解读在文本之上建立了一套顽固的、强大的解释体系，它刻板、教条、贫乏、单一、概念化，把学生与文本的联系隔开了，取代了文本。另外，文本的文体解读抛离了本来的文体样式，而统一作文章解读并据此选择教学策略。无论哪一种文本，教材编写者对教学目标的设定都包含着这样一种理念：通过对文章字、词、句的理解和结构的分析，寻找出这篇范文的内在逻辑及写作方式，进而总结、归纳出一整套指导阅读与写作的方法，使学生在理解掌握的基础上加以运用，形成较高的语文实际运用能力。

总体来看，大纲时代的语文教材优秀文学作品的比重明显偏小，加之上述解读体系的掣肘，对学生成长阶段精神世界的开拓需求有意无意地采取了漠视的态度。或许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教材编写者认为只要有大纲中规定的那些“人文内容”就足够了，学生的精神世界无需再做进一步开拓。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失去的是对优秀文学作品丰富生动的感受能力，习惯于面对文章时忽略作品充沛的情感、独特的体验而专门从中心思想或是写作特点角度感知课文。语文课在这样一种情境中使学生渐渐失去了兴趣，教师在这样的教材以及教学目标要求下，不再钻研教材独特魅力所在，不再思考这种魅力与学生精神世界开拓的意义关联，渐渐失去了这种钻研的能力，变成了一个只会按照教学参考书教书的教书匠。

新课标带来的全新理念促使教材编写发生改变：

课标教材7—9年级136篇课文，文学作品就有92篇，大大超过了原来教材文学作品的比重。如果我们将被认为是说明文的一些作品，如《苏州园林》《绿色蝈蝈》等，在宽泛的意义上也当作文学作品来看的话，这一比重还

会增加。从文质兼美的教材选编标准来看，在“文”上，现在教材的质量远远高于原来的教材。

课标教材最大的变化在于内容的编排上，它是“学本”而不是“教材”。写在前面的话、单元说明、课文提示、研讨与练习、写作、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都是用与学生对话的方式呈现，体现对学生的尊重。单元内容主要由主题或专题构成，不追求语文知识的系统性，淡化语文实践活动中的知识支撑功能，强化实践者的主观感受和情感作用，具有较大的开放性和弹性，着力塑造学生个体丰富而健康的精神世界，培养他们的创造精神。

尽管现在还存在所谓的教学参考书，但它已经回归了“参考”的本意，对教师备课只起辅助作用，而不是起规定作用，教师需要根据学情探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

这样的编写方式带来的结果是，文学作品比重增加，课堂教学中思想交锋式的对话，使得教师不能再像原来那样备课，需要调动教师的生活积累、学术积累，需要教师日常生活中有独特而深沉的思考习惯。如果教师再以原来教书匠的眼光看待自己职业的话，他就不会适应现在的新课标要求。因此，新课标需要思想型、学者型的教师。

第三，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促使教师对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重新思考。

大纲时代基本的教学方式是师讲生受，满堂灌、教师唱独角戏的现象比比皆是。教师的基本责任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灌输知识，满足学生对知识如饥似渴的需求。这种状况延续很长一段时间，这是特定历史原因造成的，但不能说教师对教学艺术不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教学大纲的颁布，语文课性质、内容的确定，语文教学逐步走向稳步发展的方向，出现于漪、钱梦龙、章熊、洪镇涛等一大批特级教师。他们是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上第一代职业化的语文教师，也是从事语文教育时间最长的一代语文教师，其主要的历史功绩在于对教学方法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探索和构建，影响了之后几代中学语文教师。但20世纪80年代后，中考、高考对学生的决定性影响促使语文教学的科学主义日渐盛行，语文教师的教学艺术探索走向歧途，各级各类学校以及学校内部的教学评估、教学比赛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课堂上出现许许多多伪现象。

伪读书现象。教师不给学生充分阅读文本的时间，学生们在老师“开始”“停止”的“指令”中读书声渐起，又戛然而止。教师只注重阅读形式花样翻新，缺少对学生阅读效果的实际关注、引导，对如何通过不同方式的阅读使学生一步步走向文本深处缺乏理性的思考。

课堂上伪问题现象。教师的课堂提问一个接着一个，但大多数问题的思维价值不大，问题之间缺少内在逻辑。对课堂生成的有价值的问题，老师担心预设的教学目标不能完成，不敢相机引向深入。对有争议的问题，老师担心讨论时出现偏差，或避而不谈，或草草收兵。

多媒体使用上喧宾夺主。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多媒体在语文教学中被普遍使用，甚至有些地区和学校将教师是否使用多媒体作为衡量教师教学水平、教学效果的主要标准。教师充分发挥了多媒体声音、形象等可感性功能，大量使用图片、音乐、电影资料等辅助教学，但它对学生想象力和语言敏感力培养的影响很少有人注意到。

课堂上伪表扬现象。90年代后，随着语文人文精神大讨论深入展开，课堂上语文教学内容悄然发生变化的同时，教学民主逐渐为教师认同，但另一种倾向使这种民主变了味道：课堂上掌声不断，表扬之声不绝于耳，然而表扬空泛、廉价，矫情夸张，并不能使学生体会到对自身价值的认同。

新课标对学生的学习方式做了明确的说明，认为语文课程必须根据学生身心发展和语文学习的特点，爱护儿童的好奇心、求知欲，鼓励自主阅读、自由表达，充分激发他们的问题意识和进取精神，关注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与过去相比，这种学习方式最大的不同在于让学生在发现中学习、提高，而不是在灌输中学习，其核心是问题意识的培养。中学生的問題意识是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基于与文本的平等关系，以自己的阅历为起点，以探究的方式对文本追问的意识。这种追问有些可以通过自行查阅资料解决，有些则需要通过合作得到解答，可以是师生合作，也可以是生生合作，还可以是课内、课外其他形式的合作。对中学生来说，这样的追问并不一定要得到具体答案，但追问使学生产生探究的兴趣，探究的过程是学生不断吸收知识和掌握方法的过程，是学生调整对世界认识的过程，在不断追问中，学生充实了语文知识，丰富了语文素养。追问既是目的又是手段。

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首先要改变教师的教学方式。教师的主导作用不会因提倡学生的自主学习而被削弱。教师在教学中“真问题”设计、提出的方式，如何有效地围绕“真问题”引导学生思考、探究，如何进行个性化指导，成为一堂课成败的关键。这种课不一定热热闹闹，却启人心智，不一定非得师生对话，却可引起学生的兴趣，课堂的形式变得不那么重要，却在更高层次上增强了教学的有效性。因此，教师对教学艺术的追求就是要超越对课堂形式的刻意追求，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完成课堂教学。基于这样一

种课堂理念的教学，学生是主体，但处处显示出教师的存在。教学艺术从来不是一个形式问题，它是由教师的学养支撑起来的，是一种由内到外的展示。

应当指出的是，大纲时代的那些伪现象今天依然存在，有些地方愈演愈烈，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已经出现，教师教学方式的改变显得迫切，教师对教学艺术的认识应做相应的调整。

上述三大因素决定着语文教师专业成长应当朝着一个方向转换，那就是学者化方向。语文教师应当是一个现代人文知识分子，有自己丰富的精神世界，尊重自己的学生，平等地对待他们；应当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对待语文教学中的问题，对教材有自己的独特解读，对教学有自己的方法，将学问与教学艺术统一起来，引导学生通过语文学习不断开拓自己的精神世界，提高语文素养。一个平常不搞科研的教师对课题的认识和科研型教师对课题的认识肯定是有差异的，对教材有自己的独特研究，甚至形成一定的研究成果的教师对教材的认识与依靠教学参考书备课的教师肯定也是有差异的。新课标的实施对教师的知识结构、知识视野、认识深度以及对学生的理解程度都提出了挑战。教师素质需要较大的提高，以便完成适应新课标的角色转换。

（本部分原题名《新课标下语文教师专业成长方向转变的必要性》，载于《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与李娜合写，现略有改动）

第一讲 中国语文教育的发展

“中学语文教学法”既是一门理论课程，又是一门实践课程。作为理论课，它不是凭空而来的，一方面源自新的教育学、心理学以及语文等各科的知识，另一方面是对以往语文教育经验的总结，因此，回顾一下中国语文教育的历史很有必要。这里，我们主要谈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和现代语文教育的发展。当代语文教育的内容在讨论本学科基础理论时会逐一介绍，本讲不再涉及。

一、古代语文教育

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可以分为远古至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以及明清七个阶段。

（一）远古至西周时期

这一时期产生了原始的文字，即所谓的“仓颉造字”。文字的产生必然会促进教育的诞生，但最初的教育只不过是家庭式的。随着学校的出现，教育就变得规范化了，语文教学就此有了专门的场所。

我国古代学校的设立，从虞舜时期就已开始。虞舜时期有上庠和下庠，夏代有东序和西序，商代有右学和左学，西周时期有国学和乡学。这些学校是按照等级设立的。贵族阶层子弟上的是大学，学习专门知识，包括礼乐知识；中下层奴隶主子弟上的是小学，学习应用技术，如计算、识字、文学、礼、乐、射、御等，入学前还要学习祭祖问卜知识。

大学和小学的知识以“六艺”为主，即“礼、乐、射、御、书、数”。

“礼”，包括祭祀时的祭祀礼、结婚时的结婚礼等，涉及政治、道德、历史等。

“乐”，包括音乐、舞蹈等。

“射”，包括射箭、投掷等。

“御”，包括驾车、骑马、习战等。

“书”，包括识字、写字等。

“数”，包括算术、计量等

这些课程除“书”外，看似和今天的语文课没什么关系，但应当看到，它们都是借助语言文字传授的，也就是说，语言文字的学习，是“六艺”的学习前提。

歌谣、祝辞、传说、神话等也是重要的语文学习内容。有些是口口相传，有些以文字形式记载下来，成为后世语文教材，这些内容大多被收在《山海经》《楚辞》《淮南子》《穆天子传》《庄子》《国语》《左传》等书中。

（二）春秋战国时期

这是一个历史大变革的时代。就教育来说，由“学在官府”转为“学在四夷”，主要表现在私学的发展和稷门学宫的设立。

私学的兴起，大批新兴地主、商人、平民子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文化下移，礼乐崩坏，促使百家争鸣。当时许多思想家同时是教育家，如孔子、孟子、老子、荀子、庄子、墨子等，以办私学促进自己思想的传播。典型的如孔子，其私学中，先后有学生三千人，贤良者七十二人。墨子自称从者数百人，其学生和孔子的学生一样散居各地办学或从政。

当时的齐国在临淄稷门设立学校，号称“稷门学宫”，它不是哪一家学派办的私学，而是各派均有代表人物，或教学、或学习。收徒授业与学术研究并行，并在适当的时候为统治集团提供咨询服务，因此，“稷门学宫”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研究型大学或社会科学院之类的机构。担任学宫讲学的，有邹衍、淳于髡、田骈、鲁仲连、荀子等人，其中，荀子曾3次担任学宫祭酒的职务。

语文教材上，这一时期已经有文字蒙求课本《史籀篇》。孔子作为教育家，对古代文献的整理肩负着学术研究和教材使用的双重使命，所以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为此他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使其成为当时教材一时之选。另外，楚国诗歌，历史散文，诸子散文，等等，既是当时诗歌、散文创作的代表性作品，又是语文教育的基本教材。

这一时期的《学记》，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上出现最早、内容最完备的教学论著作，对学制的建立，学校教育的作用、目的和任务，教育教学的过程、原则和方法，教师的教学能力和职责，学生的学习态度和方法，等等，各方面都做了提纲挈领的论述。《学记》指出要“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对教育

的终极目的做了言简意赅的说明。

关于教育制度和管理,《学记》总结了“大学之道”的基本框架:小成阶段七年,大成阶段两年。

前七年分为四段:

第一段一年,“视离经辨志”,主要在于考查学生的阅读能力,包括章句分析能力和识别心智的趋向。

第二段二年,“视敬业乐群”,考查学生的专心程度及与学友的和睦状况。

第三段二年,“视博习亲师”,考查知识的广博程度、是否尊敬师长。

第四段二年,“视论学取友”,考查学生的研究学问和交友能力。

小成阶段相当于15—21岁最基础的教育阶段。

大成阶段的二年,相当于22—23岁,是深造阶段,学习做到触类旁通,闻一知十,政治上成熟坚定。

以上九年的教育,要成就对社会有用的人。

《学记》提出了“教学相长”“长善救失”“善教善喻”“藏息相辅”等教育原则,还阐述了“问答”“讲解”“比较”等基本教学方法。

(三)秦汉时期

秦统一六国,建立了秦王朝,采取禁私学、以吏为师等政策。统一文字,形成秦书八体,在此基础上,编写写字和识字课本。重视识字写字教学成为秦代语文教育的重要特征。丞相李斯的《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的《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的《博学篇》,都用小篆书写,起到了使文字规范化的字书和识字写字课本的双重作用。

“焚书坑儒”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劫难,因此西汉经书存世少而又少,只能靠一些经师记忆、口授、讲解。文字记录、内容阐述等成为教学重点,因此产生了以治经为主要内容,重师法、重证据的所谓“汉学”,形成了汉代语文教学重视识字、写字教学,重视教师讲解,重视记诵的特点。汉代的识字写字教材有《仓颉篇》(间里书师合秦代的《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而成)、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李长的《元尚篇》、扬雄的《训纂篇》、贾鲂的《滂喜篇》、蔡邕的《勤学篇》等。

史游的《急就篇》是现在保存完整的秦汉时期的唯一文本,使用时间长达六百年,共34章,前32章每章63字,后两章每章64字,合计2144字。34章中,史游写了31章,其余三章,即7、33、34章,是东汉人续写的。《急就篇》的编写体例依李斯《仓颉篇》的做法,又有自己的特点,简而言之,就

是集中识字，整齐押韵，注重实用，知识面宽，读写结合，强调思想教育。

汉代的阅读教材有《孝经》《论语》《五经》（即《易》《书》《诗》《礼》《春秋》）以及诸子文章。除此之外，汉代还出现了教学专门用书《尔雅》。《方言》和《说文解字》也是语文学习的专门工具书。

读经是汉代语文教学的主要内容。围绕读经，教学内容主要包括断句、正音正读、释词、解释段落大意、讲解语法修辞和文化背景知识。

汉代也重视写作教学，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和识字教学相配合，主要教日常应用文，包括地方簿籍、文书、各种记录（劳作记录、出入关记录、传递邮书记录、传递烽火记录、边防执勤记录等）、民间契约、买卖债券、私人书信、遗嘱等。

第二阶段，和读经相配合，训练官僚机构使用的各种文体。如辞赋类，包括赋、诗、歌、七言等；书表笺奏类；颂诔箴铭类；论说类；碑志类；等等。

（四）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教育总体来说受到的影响很大，官学尤甚，但也有几个亮点。就官学来说，西晋初期，太学之外有国子学，北魏官学校发达，国子太学生多时曾达几千人。这一时期突出的是私学，特别是家学盛行。

蒙学教育仍以识字写字为主，与汉代相差无几。识字教材秉承汉代传统，编成韵语，同时向学童进行知识教育和学习态度、立身行事方面的教育。教材有《三苍》《劝学》《发蒙记》《始学》《千字文》等，以《千字文》为代表。

《千字文》，作者周兴嗣，成书于公元六世纪（南朝梁天监初年），直到十九世纪我国农村还用它教儿童，是我国使用时间最长的一本识字教材。《千字文》每四字为一句，共125句。句法整齐，讲求声律，强调用典使事，追求文采辞藻。具体内容包罗万象，涉及天象、岁时和名贵物品，歌颂古代帝王，一个人应有的品行修养和伦常道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地理常识，对士子爱惜时光、抓紧学习的勉励等。

这一时期的阅读教学一般是在学童学完识字教材后进行的。教材有作为诵读教材的《孝经》《论语》《五经》《老子》《庄子》以及史书、诗赋文章。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经学之外，文学是这一时期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关于文学的著作、教材应运而生，如萧统的《昭明文选》、

刘勰的《文心雕龙》、锺嵘的《诗品》等。

《昭明文选》把文学与经学、史学、玄学分开，在编纂上，经书不选，子书不选，说话的记录不选，史书除了具有文学价值的赞、论、序、述，一般不选。其编选体例是按照文章体裁分类编排，共39种文体，700多篇文章。

就教学方法而言，仍以自学为主，辅以教师讲解。教师有的是自己家庭中的长辈，有的是学馆老师，子弟众多的家族一般兼有自己的学馆。有些人想要深造，就外出寻找名师指点。自学的方法首先是读书。读书分目治和口治两种。所谓口治，就是朗读和吟咏，达到熟记背诵的目的。所谓目治，就是浏览快读。其次是抄书，那时还没有印刷的书，要读书就要靠自己抄写。教师讲授大多是个别辅导，有时教师也上大课，听讲的有几百人甚至上千人。有的讲学，不光学生听，同行专家和朝廷官员有时也来听讲。听讲时可以提出问题，质疑问难。

写作训练是和阅读教学同步进行。一般来说，南朝学童学习写作的时间比北朝要早一些。所学内容包括：

(1) 自抒情感的诗歌和用于应酬的诗歌，如“献诗”“公宴”“祖饯”“游览”“赠答”等。

(2) 公文和一般通俗应用文，如文契之类。

(3) 议论文，受当时社会上盛行的学术论辩之风影响，对问答体的论说文尤其重视。

(4) 书信。

南北朝时期对文章韵律刻意追求，骈文和近体诗成为主要文体。根据这些文体的写作要求，基础训练做相应的调整，具体包括：

(1) 作文用典的隶事训练。

(2) 音韵的训练。分双声叠韵训练、四声训练、反语训练等。

(3) 包括比喻、对偶等在内的修辞训练。

(4) 连珠训练。

为配合这些训练，编写了一些相应的参考书，如音韵方面的《声类》《韵集》《四声谱》等，隶事方面的《皇览》《四部要略》《类苑》等，修辞方面的《对林》《语对》《对要》等。

这一时期有一个特殊的语文教育现象值得注意，就是南朝的“官话”教学和北朝的“双语”学习。

金陵本是三国吴建都的地方，东晋时，洛阳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有六七，司马睿在此地建都，侨人掌握了东晋的朝政大权。吴语与洛阳话